

冰 心

希望你们以固有的天真纯洁的心,又用充满了爱和同情的眼光,来看自己周围: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和现状,一切能使你动了真正的感情,使你觉得非写下来不可的时候,才郑重下笔。这种文字往往是“真”的,而“真”和“善”、“美”又是分不开的。“真”和“美”的文字,又总是有激励人们向上的“善”的社会效果!

沈从文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却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艾 青

没有想象就没有诗。
诗人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诗人把互不相关的事物,通过想象,像一条线串连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
不论是明喻和暗喻,都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到具体之间的一个推移、一个跳跃、一个转化、一个飞翔……
所有意象、意境、象征,都是通过联想、想象而产生的。
艺术的魅力来源于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丰富的想象。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虽然是各自独立的,却又是互相联系的。
所有的思维总是从具体中找抽象,从抽象中找具体,他们互相牵连着,飞旋于大千世界中……

夏 衍

我们描写人物,常常简单化、刻板、不够鲜明、不够突出、没有典型性,这是为什么呢?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通过典型事件、典型动作和语言来刻画典型性格这一点上,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应有的知识。
我们常常看到在剧本的第一页,人物表上写着:甲、老奸巨猾,乙、性情暴躁。但是,这种性格只写在人物表上作为注解,而没有把甲的奸猾和乙的暴躁在动作、行为、语言、细节描写中刻画出来。为什么?一句话,我们的本钱还不够。
描写人物的简单化的例子很多,如:描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常常看到“两条又粗又黑的小辫子,一对又亮又黑的大眼睛,穿着一件花布衫”,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其实漂亮的女孩子也可以不梳小辫子,也可以不穿花布衫,假如描写得好,小眼睛也一样是迷人的。为什么老这样写?因为缺乏描写的本钱。

赵树理

我想谈谈材料与创作的关系。有几位同志提出,“曾被新事物感动过好多次,想写,也非名利主义,只是写不出。”我想把我对小说材料的理解谈出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材料在自己的记忆里,有整块的,有化了的。整块的就是真人真事,化了的就是某个人或某一类人物的一连串的特殊(不是一般)印象。整块的材料在我说来用处不大(特别是真“事”),因为它不是为某一个主题而产生的;而某一个主题也不可因为迁就它而缩小其普遍性。化了的材料虽然在脑子里或者笔记本里查不出来,但是积累得多了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主题要求它干什么它就能服从命令。我们碰到一个生环境,或者出了个什么事故,便可以想让自己的父亲在场应有什么表现,哥哥在场应有什么表现,爱人在场应有什么表现,而真要是让他们来了,他们表现的会大体上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

张光年

文学作品应当通过典型性格的创造,揭示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强调描写社会现象的本质,要求作家在创造典型的时候,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只强调描写社会现象共同的规律性,不强调从生活出发,通过精心选择的个别现象,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表现生活的真理,这也会鼓励公式化的描写。就我们的某些公式化的作品来看,有些描写农业合作化和描写工业题材的剧本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格式,形成了难以突破的框子,不就是和作家只注意共性,不注意生活特性的描写有密切关系吗?

马 烽

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缺乏深刻的理解,不敢大胆地揭露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作家的笔没有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而又完全抛弃了丰富的生活,把人物禁闭在一个狭小的框子里,这样,无论如何不可能刻画出那种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来。
作品中每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都是作家对于生活长期的感受,经过一番艰苦的劳动,逐渐形成的,如果缺乏实际生活,绝不可能写出那种性格鲜明的人物来的。但为什么有些作家,譬如有些工农出身的青年作家,生活经历很丰富,却写了一些概念化的人物呢?我想主要不外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是受了这种概念化创作方法的影响,以为刻画人物性格,只有采取那种配方的办法;其二是由于自己文学修养差,创作经验不多,不知道如何来表现人物性格,不善于从多方面,通过一些恰当的细节来描写;其三是由于懒惰,缺乏一种大胆的创造性,因为按那种处方配制,是一种最省力的办法。

前面有灯光

□赵丽宏

中国作协的青创会,是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大聚会。我曾经两次参加青创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第一次出席青创会,是1986年,那一年我34岁,是青创会的正式代表,还是上海代表团的领队。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青创会,“40后”、“50后”的作家,是这次青创会的主体。有些年龄稍长的作家,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可以说,这次青创会,集聚了“文革”之后涌现出的大部分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开会期间,和很多同辈的作家相聚,其中有熟悉的朋友,也有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作家。我们都曾经历过“文革”,都有过“上山下乡”或者其他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是文学的陪伴和召唤,使我们走过苦难和曲折,走出黑暗和混沌,寻找到人生的目标。

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巴金先生的贺信,那些情真意挚的话语,让我们感动:“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

这次青创会,开幕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就是1987年元旦。我们在京丰宾馆迎接新年。会议的后半程,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取消了一些原定的议程。这样,开会的日子就变得非常松弛,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作家之间相聚交流的机会

更多了。

开会期间,北京突然大雪纷飞。只一夜工夫,京城就成了一个白雪茫茫的世界。早晨醒来,面对窗外雪光耀眼的白色天地,心里有一些沉重的联想。窗外有一根电线,积雪在电线上累积,竟有两寸高,柔软的电线变成了一根冰冷的雪带,横亘在我的眼前。然而这根雪带维持的时间很短。两只麻雀从窗前掠过,它们在空中急急忙忙盘旋着,寻找落脚的地方。我以为两只麻雀无法停留,窗外到处是雪。想不到它们找到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落脚点——窗前的那根电线。一只麻雀先是从下而上掠过电线,翅膀只是轻轻地一拍,电线上的积雪便“噗噗”地落下一段,另一只麻雀也如法炮制,又拍下一段雪,然后再一先一后停落在电线上。它们轻松地抖着羽毛,不再把周围曾使它们惊慌迷惑的雪世界放在眼里。那根被积雪覆盖的电线在它们的脚下有节奏地颤动着,积雪在不断地往下掉,往下掉。大雪忙忙碌碌经营了一夜的封锁,只十几秒钟便被两只小麻雀瓦解了……

那天上午,看着窗外的雪景,写成一篇散文《看雪》,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只要有美丽的生命在,谁能阻挡春天呢!”这篇短文,后来竟被很多报刊转载,前不久,还有香港教育出版机构来信,说要将此文收入香港的中学课本。不过,年轻的读者未必能窥知我写此文时的心境。

文学在那个年代,受到很多年



轻人的关注,到处可以遇见文学的“粉丝”。开会期间,有不少文学青年赶到会场来寻访与会的作家。特邀代表雷抒雁是被年轻人寻访较多的一位,下雪的那一夜,有人和雷抒雁开玩笑,以“粉丝”的口吻打电话到他房间,说自己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拜访他,正在大门口等着。打过电话后,大家躲在窗后看热闹。雷抒雁接电话后,急急忙忙地下楼,冒着风雪,奔向大门口……很多人在窗户里看到这一幕,当时感觉好笑,却也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热情和真挚,他不愿让等候在风雪中的文学爱好者失望。雷抒雁留在雪地上的那一行脚印,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再一次参加青创会,是2001年了,那一年,我49岁,已经过了开青创会的年龄,成了特邀代表。与会的作家名册上,有很多我没有见过面的年轻作家,但他们的文字,早已给了我深刻印象。听他们生机洋溢的发言,也让我感觉欣喜。会议期间,去参观了新落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的大门上,印有巴金的手模,年轻的作家们抚摸着巴金的手模,感觉似乎是在和一辈作家握手。

写这篇短文时,又想起了巴金当年对年轻作家的深情嘱咐。路上虽有泥水,有冰霜雾障,但前面有灯光。只要有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中国文学的前景,是永远不会暗淡的。

保持青春活力 讲好中国故事

□徐 坤

我有幸参加过两次青创会。2001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青创会时,还是一名中国社科院的青年作家代表,到了2007年11月第二次参加青创会,就已经以北京作协领队的身份前去了。感觉青创会就像沙漏计时器,让人老得快,于不知不觉之中,静静量出了每个人的写作年轮,同时也记录下时代氛围的变化。

2001年仲春时节的青创会,在北京五环边上的北京会议中心召开。那时,北京正雄心勃勃筹备申办奥运会,四处都是沸腾的翻建扩建景象。刚落成不久的北京会议中心,四周还是大片郊野,夜晚黑黢黢一片,出入极不方便。一群以“60后”作家为主力的青年代表聚拢在一起,意气风发探讨着文学的跨世纪问题。记忆深刻的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作协领导讲话稿中点名表扬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从老子庄子到星河杨鹏,令人倍受鼓舞!2007年冬季在北京西车站附近的铁路大厦召开第五次青创会时,北京已经进入举办奥运会前的冲刺阶段,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型钢筋地标建筑耸立在四九城里,中国即将向世界展示新的英姿。青创会的主力人群也已变成是一拨“70后”作家,他们躬逢其盛,探讨的主题是新世纪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而“60后”那一拨参加上一届青创会的作家,成就经受了检验,6年时间,很多人文学成绩斐然,已经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今年秋季的青创会,应该是“80后”一代作家当主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新人在成长。青创会永远是热闹的,鲜活的,朝气蓬勃、激情四射。它对一名年轻写作者来说,是助听器与加油站,也是一所高校和大讲堂。虽然时间短暂,但如高手相见武林比剑,有形无形的过招之间,高下立现,让人学然后知不足。每个写作者都会以曾经参加过青创会而自豪。愿新一拨与会的年轻朋友能够珍惜青春大好年华,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重托,以手中的笔讲好中国故事,描绘出新时代的中国梦。



青春·文学·梦想

□李 浩



写下这个略带煽情的题目是因为记忆,和青创会有关的记忆——我说的“青春”其实更早,早到……那一年,我大约20岁吧,接到作家鬼子的一封信,说他将来河北石家庄参加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有时间的话我可去一下。那一年是哪一年我不想去想,是故意不去想不去查,我愿意模糊,因为感觉它距离现在还很近,这个错觉可能会让我一直“年轻”——我去了。和沧州文联的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当时,鬼子还是《漓江》的编辑,我有篇很有问题的小说经朋友海涛的手投给了它。

我们占用了午饭后的时间,一直在谈,鬼子给我上了一堂文学普及课。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李浩,现在许多大作家是不会和你纠缠技术问题的,他们肯定更愿意谈文学的创新和思考、人类的救赎,但有一个关是像你这样刚刚写作的人必须要过的,那就是叙事关、故事关。你得学习如何完成故事,如何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对别人构成吸引,这一天,你没过,回去,你找你喜欢的小说,找你喜欢的作家的小说来,把它拆开来,看它们是如何结构故事的。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受益。之后,用半年多的时间,我一遍遍去拆解别人的小说,看语言,看结构,看叙述方法以及埋伏、对话、色调。直到自己有了小小心得。现在,看一部好的作品,我还有拆解的习惯,我愿意继续下去。在我们谈话期间,和鬼子一个房间的东西也插过几句话,似乎是对鬼子某一观点的反驳,我没记下具体的内容,但记下了两个人的认真和坚持。

快开会了,我们离开,在宾馆走廊里遇到三五个人,他们停在那里旁若无人地谈论,我记住了他们口中一个完全陌生的词,“诗学”。我写青春、文学、梦想和温暖,更多的时候是源自于对那次青创会的记忆,它是我个人的源,那时我只有20岁。我感谢鬼子,他的拆解方法让我终生受益,我也愿这条经验和更多的爱好者一起分享;我感谢和他争论的东西,感谢偶遇的那些陌生诗人(他们也许大名鼎鼎),他们在我心里树立了一标杆,让我见贤思齐。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那样。我希望,自己能在一生中保持那种对文学的激情和虔诚。我希望,我在青年的时候,也能参加青创会,和另外的作家们争论文学的方法和“诗学”。走廊里的时间也不放过。

年纪,也未见得能够缩短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而在读者那里,年轻不年轻的虚无本质就更明显:一个真正的读者不会在意这个作者是20岁还是30岁,是60岁还是80岁,甚至不会在意他已经死去了1000年还是200年。他要看的是作品,只是作品。如此而已。

“拿作品说话。”这5个字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要命的真理。

当然,年轻也还是自有其些微的意义,只是这意义仿佛是太过有限,简直只是相对自己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比如我,如果能活到80岁,那或许我还能写差不多40年。但是,果真如此吗?谁知道呢?谁知道这40年里我会开什么小差呢?谁知道我会不会写出什么不像样的东西或者连什么不像样的东西也写不出呢?

我不知道。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是相似的,会更是相似的,人却定然是不同的。信笔至此,想到像青创会这样的会,没有多少人能连着参加几届,我的心里便越发安静的了。我想,作为一个客人,到会之后,我能做的就是尽赏主人之欢,在心里默默地喝彩,然后再静静地离会,再然后,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去尽一个写作者的本分吧。

做客者说

□乔 叶



因为超龄了两个月,这次青创会,我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会的,所谓特邀的身份,此时此刻在我的理解就是:本已没有资格属于某个群体或者某个场合,因为被格外厚待,才被允许参与。所以,被特邀的我其实是以客人的心情来赴会的。在我的意识里,这是她的会,他的会,他们的会,而不是我的会。所以,来参加这届青创会,我的心再不像上一届那样雀跃和激动,而是静的:安静,宁静。

静的缘由还有一个:很清楚许多熟悉的朋友都不能到会了。文学界里我所挚爱的那些朋友大多是“50后”和“60后”,当然,以我的浅陋学识,他们和我交往都是迁就的、宽容的,我却一向不自知地喜欢和他们混在一起,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所获颇多。“勿友不如己者”,我交往的朋友一般都是比我强的人,这强无关于世俗名利,只在于心。他们精神世界的高远和辽阔给予我的

影响无法衡量。因此只要在什么会上见到他们,我便会可着劲儿和他们尽兴攀谈,比如作代会。但这届青创会他们是必不参加的。如此一想,便不免有些落寞。

“别急,你还年轻。”每当我听到我抱怨自己的不足时那些朋友都会这么劝慰我,现在,我终于明白:所谓的年龄上的年轻,对于写作而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时间是最仁慈的,谁都会年轻,也都曾年轻。时间又是最残酷的,黑发终将霜雪,年华终将老去。时间又是最平和最没有性格的,有的写作者,可能一落笔就已经老了,而有的写作者,写到白发苍苍也还在青春期。

——忽然觉得,由年龄上的年轻来断定一个写作者的前途,说什么越年轻就越有前途,这真的只是一种客气的理论。我已心如明镜:那么多比我年长的前辈,他们和我一样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大踏步地超越了我。而当我到了他们现在的

穿越时空的人

□了一容

第一次参加全国青创会时,我尚在西海固的一个小县城里,当时可说是年龄偏小的与会代表之一。这应该感谢余光慧和石舒清他们的推荐。现在,常常会在心底里感激余光慧他们那一代人:敬业,无私,给了我们许多外出学习的机会。时间愈久,回想点点滴滴的培养,愈觉得令人感激。余老师他们虽然退休了,但我在心里感谢他们,公道、无私。或许还有偏爱,对西海固的偏爱吧!

那一年,我是和来自西藏的扎西达娃老师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扎西达娃老师似乎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永恒地停留在那样的年龄、状态和面容里。后来,每隔三五年便会见到扎西达娃老师一次,发现他形容依然。我就感到非常惊讶:他的样子就像他的小说一样魔幻,时间在他那里仿佛静止了。我就想到

10年埋葬了多少人,20

了遥远的西藏,想到可能只有在那样苍茫混沌神秘的时空地域里生活的人,才会让人感到如此奇异和魔幻。

我非常喜欢扎西达娃老师的小说,读他的小说,就像把我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埋没的世界打开了。我想学习扎西达娃老师那样的写法,那样“经典式”的思维方式,在国外是可以获得狂热追捧的。他这个人,是让你越来越会对他产生思念的这么个人。尽管扎西达娃老师和我没有通电话,没有通信,但是不代表我们彼此没有牵挂。那种无形的信息是常常相互传递的。这种信息很强烈,让人能清晰地感觉得到。有些人,在一起很短暂,但是一辈子不想再见到;有些人匆匆一面,你却永远地牵挂着。这是一个人的气息和人格魅力吸引着你,扎西达娃老师就有这样的魅力和信息。



年更不堪言说,又有多少人降临到了这个世上。文学之路是残酷的,许多人写到老,依然只在乎一年发表了多少东西,选刊与否转载了。可是,有多少人在认真思考如何用几年或者几十年创作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著作?真正的写作者不该在乎每年制作了多少个像砖头一样的东西。表面的红火往往是非常空虚和经不住时间检阅的。

又到青创会的时候了,就写作而言,依然感到惭愧。但是,我很希望能在这样的场合再见到我的老朋友扎西达娃老师。他还那样魔幻般穿越着时空吗?

记得在电梯里遇到余华。他是特邀代表,和我也不在一组。我上去的时候他已在电梯里。我没有和他说话,只是,悄悄地看着他,甚至有些屏住呼吸。就是这匆忙的一面。我其实想和他搭讪,我其实想说,感谢你,在我刚刚开始小说写作时曾对你有帮助,甚至让我摆脱过于明显的影响;我其实想说,我希望看到你新的创作,我希望它……我无话可说。那一代,和上一代,有许多作家给过我滋养,我心里感激他们,也感激当年曾有的年轻和激情。走在文学这条路上,有时为“创作”我不得不过河拆桥,但那桥一直在心里。

记得遇到陈建功先生。他在我组参加讨论,很热情地和我们交流,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当然不认识我。我报上名字,并向他表达感激,他才恍然,你啊,你是啊,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两年后,我在广州和他再遇,他又认识我了,我只得再报一次名字。同样情况的还有何建明,在绍兴他向人打听我,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在鲁院,他在讲台上我坐台下,课间休息时我过去打招呼,他有些漠然:好,好,你是?我希望本次青创会还能遇到他们,不过我也感觉,他们可能又不认识我了。我满足这种境况,我希望文学的归于文学,梦想的归于梦想,温暖的,给予每一个爱着的人,我只要默默感念就行了。